

JESUITS

THE JESUITS
AND MARITIME TRAD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戚印平 著

耶稣会士与 晚明海上贸易



MARITIME TRADE

耶稣会士与 晚明海上贸易

威印平 著

MARITIME TRADE

THE JESUITS AND MARITIME TRAD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会士与晚明海上贸易 / 戚印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201 - 1153 - 9

I. ①耶… II. ①戚… III. ①耶稣会 - 传教士 - 传教
事业 - 研究 - 中国 ②对外贸易 - 贸易史 - 中国 - 晚明
IV. ①B979.2 ②F75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6740 号

耶稣会士与晚明海上贸易

著 者 / 戚印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赵怀英 张文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 5936715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153 - 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J E S U I T S

Appelage de
S. Lazaro



前 言

苏轼《题西林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诗写庐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乃千古名句，但以史家角度看，此诗或别有玄机：即便再熟悉的对象，换个角度，亦往往有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

西人钟鸣旦（Standaert, Nicolas）在谈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时，提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又曰：“这种范式转变最典型的表现，是将中国文献作为基本材料，将中国人物作为基本研究对象。”^①作为一个欧洲学者，钟氏此言或许代表着西方汉学界研究方式与心态的变化，反观中国学术界，一种或可称之为“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却似乎从来就是正统。很多年来，利玛窦、艾儒略等少数重点人物和“礼仪之争”、“知识传教”和南京教案等相关问题，也始终是人们热情关注的焦点。

然而，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中心论”亦可能导致相对封闭的视域局限，如果将研究对象的边限定于发生在国境线之内的人和事，就不免使相关研究落入中国教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有限范畴。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反过来，此言亦可提示“从中国史的角度看世界”的新视角，由此看来，变换研究范式应当是合乎逻辑的自然选择。新的（或可称之为大宗教或大历史的）研究范式既需要我们从内部（中国）的角度考察世界，关注世界格局新变化带给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又要求我们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反观中国，从各个方面考察中国在世界格局新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很明显，研究范式的再次转变不仅会使我们的视角扩展到更为广阔（尤其是东亚区域性的地理与文化范畴）而多样（至少包括交通史、贸易史、移

① [比利时] 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页。

民史)的领域,而且还要求我们考察相关各方的自身变化(即同时期欧洲教会及相关国家的情况,包括同时期的文化复兴、宗教改革等)及其错综复杂的交叉作用。

从大宗教或大历史的角度看,16世纪以降耶稣会士在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传教活动并非单独的个别现象,而是天主教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传播及由此发生的文化矛盾与政治冲突普遍发生在中国以及邻近的东亚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形态(封建王权)与文化传统(儒学与佛教)迫使传教士不得不面对大同小异的社会处境与文化挑战;东亚各国间的传统关系以及密切交往又规定了矛盾冲突的相互影响与连锁反应。事实表明,宗教传播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大国势力范围竞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中国晚明即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由此展开。

世界上从未有过纯粹的宗教,所以也不会有纯粹的宗教传播;同理,任何商品交易的发生和影响都不会限于商品交易本身,因此相关的学术考察也不应自囿于经济的有限范畴。至少在我们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一体化的世界进程早已超越传统的国家范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亦不再限于僵硬的双边关系,例如传统的中日关系史或者中葡关系史。因此,尽管多视角的“横看”或“侧观”未必能获得一窥“庐山真面目”的理想效果,但至少可以获得更多问题,并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

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大多基于这一考虑。由于是单独成篇的个案研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又因先行发表的实际需要,史料运用及观点陈述上不免稍有重合。此番集辑成册,已有所订正,但限于各种因素,亦不能尽如人意。在此还望方家赐教,以便今后稍有寸进。

前 言 / 1

范礼安与中国

——兼论晚明中国教区的行政归属 / 1

附录一 中国澳门的耶稣会修院 / 48

附录二 给予澳门神学院院长的训诫 / 56

传教士的新衣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利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 65

《殉教图》考

——兼论保教权问题以及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的传教权之争 / 101

加比丹考

——关于澳（门）日（本）贸易与耶稣会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 161

附录三 澳门行纪（1600年） / 209

耶稣会士与晚明澳（门）日（本）生丝贸易的若干问题 / 237

耶稣会士与晚明澳（门）日（本）丝织品贸易的若干问题 / 266

附录四 关于澳门居民向日本运送生丝的组合契约以及“阿尔玛萨”
的报告 / 284

传教士与黄金

——以晚明澳（门）日（本）贸易为背景的若干分析 / 292

陆若汉研究 / 321

附录五 日本管区代表备忘录 / 405

后 记 / 429

范礼安与中国

——兼论晚明中国教区的行政归属

在此前大多数讨论中，耶稣会远东教区巡视员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神父在中国教会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在有些人看来，除了那个著名的感慨，^① 他对于中国教区的贡献似乎只限于指派罗明坚（P. Michel Ruggieri）与利玛窦（Matthaeus Ricci）来澳门学习中国语言。

然而，如果我们打开视野，破除研究对象是否进入中国内地的自我局限，就不难发现这位远东教会的最高上长对于中国教会的众多特殊贡献。大量证据表明，除了在人员配置、经费支持以及传教策略等诸多方面的幕后指导之外，范礼安一直通过耶稣会澳门修院与圣保禄学院，对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步骤与活动方式进行具体指导与严密掌控。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忽略对这位“中国教区之父”^② 的考察，中国教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将无法得到完满而合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沙勿略（Francisco Xavir）神父冒险失败后的 30 余年间，明朝政府严禁外国人入境的政策几乎熄灭了大多数耶稣会士传教中国的激情，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忘记那位“传教圣徒”的遗命，但欣欣向荣的日本教区似乎更有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吸引力。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在范礼安巡视东印度教区初期，中日两国在教会高层人士的眼里，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以该时期出自巡视员之手的两份报告为例，与日本传教区报告（即《日本巡察记》）洋洋洒洒、长达 30 章的专题论述相比，澳门以及中国内陆地

① 据说范礼安在首次逗留澳门期间，曾因无法打开中国传教之门而发出“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的无奈呼唤。参见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李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 213 页。

②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上，罗渔译，台北：光启、辅仁联合出版社，1986，第 319 页。

区只在东印度教区 40 章的巡察报告（《东印度巡察记》）中占据区区一章的篇幅而已。^①

在《东印度巡察记》第 14 章《关于中国的修院》记述中，范礼安的文字极为简略，由于当时耶稣会士尚未进入中国内地，该章的主要篇幅都被用于介绍他所获得到的中国情报，^② 而关于澳门当地教务的记录，只有以下寥寥数语：

该居留地有主教 1 人，神父 8 至 10 人。除了我们修院的耶稣会员们，没有其他修道会士（此后方济各会所属的跣足托钵修道会士也在当地设立了修院。他们从吕宋群岛渡海来此。那个修院中住着五六名方济各会士）。在我们的修院中，有 8 至 10 名神父与修士们一起生活。与大学教授（professor）的修院一样，所有成员都靠施舍生活。他们拥有漂亮的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去年才竣工，有 10 间房屋、舒适的办公室和收容力非凡的礼拜堂。但由于设计错误，一切都必须迁移到这个修道院中。此外，还有儿童用的学校。^③

① 《日本巡察记》原名《日本管区及其统辖诸事之要录》（Alejandro Valignano S. I., *SUMARIO de las cosas de Japon 1583. ADICIONES del sumario de Japon 1592.*）。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通常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 30 章，完成于范礼安首次巡视日本（1579 ~ 1582 年）之后的 1583 年。第二部分作于 1592 年，共有补遗 7 项，分别补充前文各章（松田毅一译注，东洋文库，平凡社，1985）。《东印度巡察记》原名《关于东印度管区诸事及其统辖之要录》（*Sumario de las cosas que pertenecen a la INDIA Oriental y al gouierno de ella 1580*），全文共 40 章（高桥裕史译注，平凡社，2005）。两份报告分别记述日本教区以及整个东印度地区耶稣会的传教策略、经费使用、学校建设、人员配备等情况，对于研究中国教会史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 根据考证，《东印度巡察记》的初稿完成于范礼安 1577 年岁末首次巡视马六甲期间，最后定稿是在首次巡视日本教会之初的 1580 年，全文用意大利语写成。手稿现藏于耶稣会罗马综合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Cpa 31, ff. 338 - 382v）。由于文章主题所限，这里不能一一摘录。有关篇章详见本书附录一“中国澳门的耶稣会修院”。但必须指出的是，范礼安在《东印度巡察记》中关于中国情况的大段描述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自沙勿略之后，耶稣会正式文件中有关中国情况的首次完整描述。参见范礼安《东印度巡察记》，第 156 ~ 163 页。此前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传教设想以及考察记录，还可参见拙作《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变——有关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若干记录与分析》的相关考察（臧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③ 《东印度巡察记》，第 156 ~ 157 页。作为这一记述的佐证，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神父在 1584 年 10 月 6 日于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也有内容相似的记录。其曰：“我必须报告这个中国的修院与住所。在这里，始终驻有耶稣会士 7 人，即 5 名神父与 2 名修士。通常还包括（准备）前往日本的人，始终有 2 ~ 3 人。”高濂弘一郎编译《耶稣会与日本》，1，《大航海时代丛书》，第 2 期，VI，岩波书店，1988，第 27 页。（转下页注）

值得注意的是，范礼安在此章的末尾还特意告诉总会长说：

我们耶稣会的几个会员正在学习官话，预备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才能达成目的。但是这些官话极其难懂，（学习官话）几乎孤立无助，也许（掌握它）必须花费许多时间与努力，尤其是在葡萄牙人所在的澳门港。我不清楚是否有会员能在（学习）官话上善始善终。如果不是迫于同样的必要性，进而再学习（官话），那么掌握（官话）就是困难的，而且还会耗时更久。……我们耶稣会会员中的二位神父已经在澳门当地学习这种官话，并切实表现出显著进步，我期待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为此，我留下了这二人的老师和备有（学习官话）所需一切设备的设施。这一设施在离其他会员少许的地方。^①

很显然，虽然范礼安并未点明这两位在香港当地学习中国官话的人是谁，但他们中的一人，应当是1579年7月抵达澳门并随即开始学习中文的罗明坚神父。^②

（接上页注③）另据日本学者考证，上文中的“修院”（casa）一词，原指已经立誓，完成规定课程，从事传教活动，并仅靠捐赠生活的耶稣会会员居所，通常又可用作神学院（Collegio）、神学校（Seminatio）等机构的同义语。根据不同的规模与目的，修院又可分为“casa profesa”、“residencia”、“station, smissio”、“casa de ejercicios”和“casa de escritores”等不同类型。与之相比，文献中提及的另一种耶稣会士居所“住院”（residencia），则规模较小，级别也较低，通常作为修院的附属机构（参见高桥裕史《东印度巡察记》，第24页注释4、5）。为此，除已有的中译之外，本书援引文献中的耶稣会住处，均依原文的不同，分别译为“修院”和“住院”，不一一注明。

① 《东印度巡察记》，第162~163页。

② 需要说明的是，范礼安上述报告中“我们耶稣会会员中的二位神父已经在澳门当地学习这种官话”，可能是他在日本期间对其离开澳门时的安排的回忆，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他可能对罗明坚已抵达澳门一事不知情。罗明坚在1580年11月12日致罗马麦尔古里亚诺神父的信中说：“由于印度省巡视员范礼安神父到了中国，甚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因此给省会长送信，要他委派一位神父前往，并指定意大利籍的德·费拉里斯（P. Bernardino de Ferraris）神父担任这个工作……但德·费拉里斯因一些阻碍不能前往，于是省会长便指定我去中国”。又曰：“由马六甲平安抵达中国，不幸到时，巡视员神父于15天前动身去了日本，而给我们留下书面指示，要我尽心学习阅读、书写与讲中国语文”（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罗渔译，台北：光启、辅仁联合出版社，1986，第430、431页）。事实上，在范礼安1583年3月9日结束对日本教区的巡视并返回澳门之前，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的耶稣会神父始终只有罗明坚一人，而利玛窦后来抵达中国，也是源自罗明坚神父的请求。罗明坚在1580年11月8日致罗马麦尔古里亚诺神父的信中声称：“今年我曾给巡视员范礼安神父去信，是否能派一位神父给我做伴，因为我一人颇感寂寞，我曾多次希望能派利玛窦来助我，目前他正在果阿”（《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27页）。1583年2月7日，罗明坚再次致信总会长阿桂委瓦，称“去年巡视员神父从果阿调利玛窦神父来和我做伴，一起赴中国传教，（转下页注）

另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范礼安还明确告诉总会长说，他为罗明坚等人预备的学习设施是“在离开其他会员少许的地方”，换句话说，罗明坚等人的语言学习不在耶稣会澳门修院之中，而是有别于其他会员住处的另一场所。我们不清楚巡视员此举有何用意，即担心修院的日常教务会干扰罗明坚的语言学习，或是为了避免修院中的沮丧情绪影响后者的学习热情，但无论如何，双方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当罗明坚奉命来到澳门、为进入中国做准备时，耶稣会澳门修院是他别无选择的唯一落脚地；而且按照耶稣会的规定，修院上长也是他在当地的唯一领导。

或可作为上述玄机的注脚，我们的确可以从其他一些记载中证实范礼安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罗明坚自己的记载，一直“希望到中国去传教”的他从未于所在修院中感受到传教中国的激情，^① 由于缺少人手，他甚至被派到广州，去从事采购商品的工作，以致他的中文学习大受影响。^② 可能是因为

(接上页注②)我到这里已三年了，始终一人，颇感寂寞，利氏已平安到达澳门（按：1582年8月7日）。巡视员神父希望我多加努力学习，也希望利神父能进入中国，和我一块生活，学习中国语言，相信他有能力负起这个任务，愿天主也玉成此事。”（《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51页。）关于利玛窦来华的过程，裴化行神父的《利玛窦评传》有较详备的描述。其曰：正是由于罗明坚的要求，范礼安从日本致信印度省区长文桑特神父，让利玛窦中断学习，将它立即派往中国。范礼安的信件在1582年复活节之后（4月15日）抵达果阿。而利玛窦才因此仓促出发，与其他7名耶稣会士一起动身前往中国，并在同年8月7日抵达澳门（详见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50~51页）。

① 罗明坚在1580年11月8日于澳门写给罗马麦尔古里亚诺（P. Mercuriano）神父的信中也抱怨道：“……请您务必以‘基督的心肠’，用热切的祈祷给这个艰巨的工作帮忙，因为这里（澳门）的会士们对这个传教工作非常冷漠，毫不关心。有些事以人的力量而言，是非常困难而不易胜任，但为天主是轻而易举的，所有的光荣全归于他，其余都不算重要了。最好您嘱咐东印度省的上司们对这件工作多加关注；假使没有范礼安神父特别重视这件事的话，对皈依中国信仰基督一事不知会有什么结局？下面是一个例子了：‘一位神父可以从事会中的其他事业，为什么浪费大好光阴学习什么中国语言，从事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26页。

② 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记述道：“这些平凡的开端，有很快获得更丰硕的成果的希望；但对于澳门这块土地有两个障碍，都是由缺乏人手而引起的。神父们为照顾葡萄牙人的需要，要尽许多责任，以致罗明坚神父必须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就要牺牲他很多学习中文的时间。其次，当他离澳门到省会去参加集市时，他在家所做的工作就因缺乏替身而中断。这自然意味着对事业的巨大损失，因为两次长期的集市要花差不多半年时间。”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第146页。令人回味的是，罗明坚在前述写给麦尔古里亚诺神父的信中并未对他的这一额外负担表示反感。他声称：“我趁有船开往印度之便，给您去信后，便收到中国一省的省会广州来的一个好消息，广州离澳门不远，约有一百多公里（原文作50罗马里），在澳门有我们的会院一座。治理广东的官吏们准许住在澳门的全体居民，不论住在何区，不论任何身份，不论何者，皆可去广州经商，不必要求特别许可，什么时候离开任便，但为避免拥挤，产生混乱，每条（转下页注）

面临类似的氛围，在1583年2月13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Aquaviva, Claudio）的信中，初来乍到的利玛窦亦对罗明坚的遭遇极为愤怒，并声称当地耶稣会士对于传教事业的冷漠“几乎使他变成了殉道烈士”。^①

关于罗明坚和利玛窦在澳门的尴尬境地，可能还有不便明言的其他原因，^②但不可否认的关键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澳门修院只是属于日本教区管辖下的众多修院之一，修院上长的主要职能亦是按照大海彼岸的指令，服务于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区，确保这一筹集物资、转运人员和信息传递的中继基地。因此，当范礼安在1582年将与他意见不合的原日本教区最高上长卡布拉尔（Cabral, Francisco）神父派遣到澳门、担任当地修院上长，并“兼任”尚属远景规划中的中国教区的上长时，这一落差极大的任命更像是惩罚性的贬黜与流放。^③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耶稣会澳门修院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就在范礼安携“天正少年使节团”^④重返澳门、等候下一个季风航行季节时，

（接上页注②）船只准乘五位葡萄牙人。这样新的措施为他们葡人太方便了，从此可以更方便、更自由地和中国交易了；因为以往一年只准一次前往经商。这为我们神父们也是件好消息，尤其为我，因为我基于服从来到这里，准备进入中国内陆已一年了，目前正在学习中国话与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等候一有机会便前往内陆。”《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25~426页。

① 利玛窦在信中说：“我们原则上须要这里神父们的帮忙；从前上主伟大的仆人高麦兹（Piero Gomez）神父在这里担任院长之职，他很支持这个赴中国传教的计划，因此什么都不缺少。现在我不知道谁要来这里做院长。这座葡属殖民地的会院很小，有学识的神父也没有。您要知道，我出此言并非因为我多口，而是要把看见的讲出来，凡没有看见的是不会明了的。这座会院与公学的神父们和上长，不但对皈依工作不感兴趣，而且还执有某种程度的忿恨。相信巡视员神父已给您详细的报告。‘罗明坚神父在这里住了三年，同院神父几乎使他变成了殉道烈士，百般为难他。’”《利玛窦书信集》，上，第41页。

② 值得玩味的是，利玛窦在上述写给总会长的信中透露出导致这一状态的另一原因。他用颇为露骨的词语声称：“同院的神父们固然都是很有修养的人；然对于传教一事，只有身当其中的人，才能明白传教的意义，然而神父您应知道，远东教务巡视员神父对澳门会院的上长对这个传教区的权力，大加限制。我相信因为我们三人皆为意大利人（按：不无巧合且令人回味的是，范礼安最初指定前往中国的德·费拉里斯神父也是意大利人），不必为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安排。省会长神父路易·威产德神父遣发一位神父来做这个会院的院长，他曾在其他公学担任校长之职。后来巡视员神父把这位院长带回印度果阿。这位神父不止一次对我说，假如他仍留在这里担任院长的话，他定要把圣马丁经院学校中正在学习要理的中国青年全部赶走。”《利玛窦书信集》，上，第41~42页。

③ 关于卡布拉尔与范礼安就传教策略的分歧及其个人恩怨，我将在其他专论中加以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光启版的《利玛窦书信集》中对于卡布拉尔的译名并不统一，分别译为卡普莱勒和卡布拉耳、加布拉列。为避免混乱，正文及引文统一译为卡布拉尔。不再一一注明。

④ 1582年2月20日，结束了对日本教区的首次巡视后，范礼安以日本大名大友、有马与大村的名义，从日本教区神学校中挑选了四位日本少年，即15岁的伊东·马休〔教名，（转下页注）

那个曾让他感慨不已的顽固“岩石”突然裂开了一条缝。1582年12月初，澳门耶稣会士收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肇庆制台来函要求罗明坚神父携带自鸣钟去见他，并慷慨地允许神父在那里建造圣堂。或因事出突然，即使是老练的范礼安本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搞得不知所措。^①

在最初的激动过去之后，准备随“天正少年使节”一起前往印度、再赶赴欧洲的范礼安立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除命令罗明坚前往中国内地之外，^②他还着手为中国教区制定新的规划。据利玛窦记载：

在赴罗马途中，他们（按：“天正少年使节团”）在澳门停留等待驶

（接上页注④）下同]、14岁的千千石·米盖尔、13岁的原·马尔蒂诺和15岁的中浦·朱利安，组成代表团，经澳门前往欧洲。因该时为日本天正十年，故该代表团被称为“天正少年使节团”。

值得一提的是，为达到向欧洲人宣传耶稣会在东方取得的传教成果，陪同使团少年的神父在航行途中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培训，其内容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民情风俗以及天体观测仪、平面球形图和海图的使用方法，并以教会习惯的对话体裁，辑录成书（*DEMISSIONE LEGATORVM IAPONENSIVA ad Romanam curiam, rebusq[ue] in Europa, ac toto itinere animaduersis DIAOGVS*……In Macaensi portu Sinici regni in domo Societatis IESV cum facultate Ordinarij, & Superiorum. Anno 1590）。1589年9月，该书由孟三德神父于西班牙语译为拉丁语，并由使团带回的印刷机在澳洲印刷出版。此书是远东地区第一部使用西式印刷机印制的教会出版物。出版后曾被用作日本教会学校的教材。有关该书的其他情况，可参见 *Der lateinische Dialog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 als Lehrbuch der japanischen Seminare. Europäische Kultur auf japanischen Schulen im XVI jahrhundert. —Analecta Gregoriana, vol. LXX. Roma, 1954*（孟三德：《天正遣欧使节记》，泉井久之助等译，雄松堂出版，新异国丛书，5，1984，第251~252页）。还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中包括许多耶稣会士对于中国的认识，其中“对话三十三，关于支那王国的习俗及其统治”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情况的最初记录之一（孟三德：《天正遣欧使节记》，第643~674页）。

① 裴化行告诉我们：“人人都欢欣鼓舞，雀跃不已，居留地内外莫不感到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然而巡视员神父……始终不表态。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这样重大的图谋所需的支持，罗明坚神父还不具备。若不是所有其他神父一致劝他趁热打铁，他几乎放跑了这个机会。”《利玛窦神父传》，第75页。

② 关于此事，罗明坚在1583年2月7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记述道：“我与巡视员神父商量，他认为不应失去这个大好的机会，乘机要求恩赐一屋，以便在那里学习中文及中国语言。在蒙巡视员神父的祝福后，便由澳门起程（时在1582年12月18日），并有巴范济神父作伴，他由果阿来澳门，准备前往日本传教，而今为给我作伴，暂随我去中国内陆。我们于1582年圣诞节后两日到达总督署所在地——肇庆，总督非常高兴，待我们非常好。”《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50页。另据罗明坚1584年正月25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记载，他正式定居肇庆是在翌年的9月。其曰：“我蒙天主垂青，于去年（1583年）9月进入帝国，是两广总督准我的。他在皇帝前颇有份量，他知道我是奉伟大的天父之命从罗马而来，希望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以便传扬（天主圣教），他待我十分友善，让我来到总督署所在地，名叫肇庆，距澳门约有150里之遥，赐我一块土地，准我在那里造房舍及一间圣堂，好举行弥撒并教授（科学）等。”《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55~456页。

往印度的时机；在逗留期间，范礼安抓紧时间促进中国传教的事务。他在耶稣会的居留地创立了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圣名团，制定的规则特别适用于入教者的精神发展。为了促进它前进，这个团体只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它国家的新入教者而设，但它的迅速进展使它在该地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①

利玛窦没有进一步说明范礼安创立的“耶稣圣名团”是个什么团体，也没有说明它与耶稣会澳门修院的关系，但从它的众多服务对象，即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新入教者”来看，它未必是专门针对中国传教事务的特定团体。

根据此后的一些信息，在罗明坚与利玛窦入居肇庆之后，耶稣会澳门修院的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改变，它仍然是遥控中国教务的上级领导机构。根据利玛窦记述，当西、葡两国合并而有人推动派遣一个西班牙代表团前往中国时，起初奉命促成此事的利玛窦等人又因来自耶稣会澳门修院的新指示，放弃了相关努力。关于此事的经过，利玛窦明白地告诉我们：

当时澳门的神学院院长卡布拉尔神父写信给肇庆的神父们，劝他们以不致损害他们自身传教事业的方式来办理这件事（指协助拟议中的西班牙使团）。他们按照这一指示办了，因为直至当时中国的教团是受澳门神学院的管辖的。^②

或因此事关系重大，刚刚从日本来到中国的卡布拉尔神父以耶稣会澳门修院上长的身份亲自前往肇庆。关于这位耶稣会修院上长对于中国内地的首次视察，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记述说：

为了解除（澳门当局担心西班牙因此损害其利益）这种顾虑，^③ 澳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7页。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4页。

③ 基于利益竞争的关系，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担心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会取代他们的地位。对此，利玛窦清楚地记述道：“当事情正在肇庆取得进展时，澳门当局却认定提出西班牙使团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省内要打开和中国人的贸易关系，而这是他们自己已在该省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一定会使他们的生意和殖民地遭到破坏。菲律宾群岛有大量的银子，那是每年从新西班牙和秘鲁送来的；但是葡萄牙人估计，如果这笔钱用来购买广东省的中国货物，那就会破坏贸易市场。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必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货物，并被迫用低价把它们在海外出售。”《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5页。

门神学院院长、中国教团的监督卡布拉尔（《札记》中文译本译作卡普莱勒）神父便决定访问肇庆的驻地，以便把第一手的消息向印度耶稣会巡视员和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长报告。^①

在1585年10月20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也提到卡布拉尔此次肇庆之行。其曰：

去年（1584年）您知道我们有幸承蒙澳门会院长加布拉列（按，即卡布拉尔）神父视察我们这座小会院，因为我们是受澳门会院管辖。加院长对我们非常满意，我们由他良好的谈话获益匪浅，尤其在归化外教人方面。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因为他曾在日本传教多年。^②

关于此次肇庆之旅，卡布拉尔本人也在1584年12月5日于澳门写给范礼安的长信中有相当详细的记述。颇为令人诧异的是，卡布拉尔没有在信中描述他作为修院上长对于利玛窦的传教事务做出指导，相反，除了为一个协助翻译教理书的秀才洗礼之外，他几乎是顺从地听从后者的安排，按利玛窦等人与官方交际的习惯方式，毕恭毕敬地参拜岭西道。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卡布拉尔在信中提出了两个建议：

……中国人是好猜忌的，只要神父们与葡萄牙人瓜葛愈少，愈分离，则愈能对传教事务保障安全。为此，希望神父下令，少与葡萄牙人往来为妙，要使神父们都变成中国人，才能免除中国人的猜忌，因此，知府同样也曾告诉他们，要如此做才行。神父都该穿中国式的长袍，头戴高方帽，这已经说过。……^③

关于卡布拉尔神父的上述建议，我们应当给予特别重视，因为它是由耶稣会澳门修院上长第一次明确建议利玛窦易换儒服的确凿记录，而且，这封信还是写给刚刚撤销其原有职务的巡视员神父。由于主题的不同，有关易服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加讨论，但考虑到卡布拉尔此前在日本因传教策略而与范礼安产生的分歧，以及他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些所作所为，我们或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7页。

② 《利玛窦书信集》，上，第63~64页。

③ 《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71页。

许会对卡布拉尔能屈能伸、见风使舵的政治家人格留下深刻印象。^①

可能是出于某些莫名担忧，或者是基于亲手缔造另一个传教辉煌的冲动，“范礼安神父非常关心他亲自组织的这次中国之行。当他（范礼安）被任命为印度的大主教并不得不放弃和日本使节同赴欧洲之行时，他就致力于充实中国教团。他作为宗教领导人的长期经验，使他能够用适合情况的命令和教诫来处理和控制形势”。^② 根据利玛窦的记录：

他（范礼安）的第一步行动是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神父为教团监督，这是个老成持重并具有其他可贵品质的人。然后，他撤销澳门神学院对中国教团的管辖权，使之只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区长的领导。当时，孟三德神父入耶稣会已有若干年。他从葡萄牙抵达印度，同行的有那些一直在为中国教团工作的人。他的助手葡萄牙人麦

① 在巡察肇庆住院前不久，卡布拉尔于1584年6月25日于澳门给西班牙/葡萄牙国王菲律浦二世写了一封信，除了率先向刚刚兼任西、葡两国元首的国王表示效忠之外，还极力鼓吹对禁止外国人入境的中国发动军事远征，并自告奋勇地宣称，定居肇庆不久的耶稣会士可以在他建议的军事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曰：“……在当地总督居住的肇庆市，已经驻有耶稣会的神父们，他们接受我们从神学院发出的命令，在7个月前前往那里并滞留于该地。……他们随后学习了可以进行说教并拯救灵魂的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得到许可，前往并滞留于该市。他们会给我们很大帮助，这么说是因为已经掌握了语言与文字，会在完成这一事业上为陛下效劳，给予我们必要的劝告与援助。就这样，我打算秘密地获取更多情报，并努力了解有助于这一目的的事情。”高濂弘一郎编译《耶稣会与日本》，1，第9页。

需要补充的是，在同年（1584年）10月6日于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另一封信件中，卡布拉尔也谈到了即将访问的肇庆修院，并对罗明坚迟迟未能为他从地方官员那里获得通行证表示不满。他说：“在离当地六天行程处，在这个广东省总督（陈瑞）所在的都市肇庆，有上长罗明坚神父以及他的同伴利玛窦。他们已经拥有高官们与总督所给予的土地，和已经建好的修院。我确信他们不会再遭流放。由于现在还是初期，改宗不能充分进行，但他们被允许留在该地，学习语言与读写，再过三四年就可以进行说教。在此期间，他们将通过良好的模范与德行去获得高官们的信用，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获得了信用。”

“当紧锁的门被打开后，应该考虑最重要的事。因为我认为，这里的布教的重要性与耶稣会所有的其他一切布教事业相比，都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阁下才如此重视它，并将它交给印度管区长。现在去那里（中国）因严禁而不可能的，所以虽然不需要助手，但（这次终于）以这一条件同意二个神父留在该地，因此，在那块土地，设置最重要上长的必要性增大了。罗明坚神父虽然很有德行，但对于这样的事业而言，他过于老实而死心眼了。我现在正试图从高官们获得许可，能否去那里巡察他们。我想这是可以现实的。如果这样，我将可以向阁下作更为详细而明确的报告。”《耶稣会与日本》，1，第28页。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8~189页。需要补充的是，范礼安被任命为大主教一说并不正确。1583年月10月20日，正在印度科钦的巡视员接到总会长阿桂委瓦的指示，要求他不要返回欧洲，而是以耶稣会印度管区长的身份留在当地。11月10日，范礼安以上述身份抵达印度果阿。参见松田毅一《解题，范礼安的生平》，《日本巡察记》，平凡社，1985，第258~259页。